

农民工住集装箱做“柜族”



11月26日，重庆一建设工地上一排排整齐的集装箱房，原来这是一个“集装箱公寓”。

据了解，“集装箱公寓”是提供给外来务工人员免费居住的。配套设施有公共卫生间、洗衣晾衣场所，24小时免费供应热水。每个房间大约20多平方米，能住4至6人，均有空调、电视等设备，深受工友们的喜爱。

人民长江 摄/CFP

梁山大力培训“技术型”农民工

本报讯（记者孙履海 通讯员杨玉建 曹井红）“参加了县总工会技能培训，我很快找到了新的岗位，每月工资待遇2400多元。”11月24日，山东省梁山县拳铺镇农民工王来军高兴地向记者介绍说。

今年以来，山东省梁山县总工会将农民工增收致富当做首要任务，首先解决无技农民主收入低的问题，围绕市场和用人单位把“技能培训”抓实抓好，增强致富本领。

据介绍，为了让大批农民工告别“体力型”挣钱向“技能型”、“智力型”转变，县镇两级工会组织对农民工进行技能培训，根据当地的就业情况定点培训，主要包括电气焊、配件加工、交通运输、饮食服务等30多项致富行业。

与此同时，根据市场需求，工会通过实施农民创业培训、职业技能培训、专项技术培训等培训项目，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和职业技能。

梁山县拳铺镇工会委员会开展了“以技能促就业、以就业促增收、关爱返乡农民工”活动，有针对性地对农民工进行订单、定向、定点免费培训，拓宽农民工就业门路和范围。目前，全镇已培训农民工4万人次，有序组织劳务转移输出3万人，2万名农民工在家门口就近就业。

“合适成年人制度”为涉案农民工子女亮起“护航灯”

本报讯（记者黄榆）11月15日，涉案未成年人小王在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庭审现场号啕大哭，悔恨的泪水打湿了他的脸颊，同时也溅落进“合适成年人”杨曜的心里。“今年14岁的小王涉嫌参与一起团伙盗窃案，这孩子从小在云南昭通农村长大，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离异了，外出打工多年无联系，直到案发开庭审理前依然联系不上他的父母。”杨曜对记者说。

自2013年官渡区推行“合适成年人制度”以来，这是杨曜第28次履行职责。据昆明市官渡区团委书记吴小军介绍，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2012年修订版）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3年1月1日开始实施，区团委请缨这项工作并成立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区团委作为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办公室已经参与300多起法定代理人无法到场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案件。

官渡区涉及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案每年有300多件，其中农民工未成年子女占刑事案件的75%，案件法定代理人无法到场的农民工子女占90%。在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时，有的嫌疑人会产生抵触情绪，对谁都不开口，这不仅会影响案件的进程，我们也无法知道该怎么来提供帮助。”官渡区检察院一名工作人员说，合适成年人制度的推行，让很多开始有抵触情绪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有了很大的变化。

吴小军介绍，合适成年人的一大作用，就是可以帮助未成年人消除抵触情绪和戒备心理，维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身心健康，同时也配合司法机关对未成年人进行帮教。

“父母在外地务工，有的联系不上，有的接到电话因为路途太远不能及时赶过来，但公安局羁押提审有时限限制，这时候我就扮演他父母的角色，给他安全感。”志愿者杨曜说。

“这是我们目前在做的。”杨曜拿出一份《李林的社会背景调查报告》告诉记者，22项调查内容详细地记录了李林的基本情况、亲情感述等。“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在审查起诉运用社会调查制度，人民检察院通过对未成年人的个性特点、道德品质、身心健康状况和家庭关系等进行综合判断，有助于全面考察，寻找对涉罪未成年人的最佳处罚方式，这份社会调查报告对这些失足孩子是至关重要的。”杨曜说。

“盒饭每次都要弄十几个菜，每个菜还不能量重。”齐海的工作除了择菜、洗菜、刷洗餐具，还要打饭。齐海刚到燕郊打工的时候恰逢冬天，为节省成本，洗菜、刷洗基本上用的都是凉水。每天6点上班一直干到晚上9点，

【案例】：

刘某某自2007年初开始在友盛模具有限公司上班，工作岗位系计算机维修工作。因为刘某某对计算机比较精通，加之自己的本职工作不是很忙，便在下班后利用自己的技术为其他厂里的电脑提供维修，收取一定的报酬。起初，公司对此并不知情，但在2009年5月份公司发现了刘某某在外兼职一事，公司人事部告知刘某某，如果其继续在外兼职，公司将辞退他，现在刘某某该怎么办？

【以案说法】：

兼职是指职工在本职工作之外兼任其他工作。兼职者除可以领取本职工作的工资外，还可以按标准领取所兼任工作的报酬。但兼



学生在练习花式篮球的基本动作。温雅迪 摄

不管孩子们最后是否会离开北京，但花式篮球的精神会伴随他们一生

打工子弟玩起花式篮球

本报实习生 王维砚

单手接过同伴的传球，绕腿一周然后将球从身后抛到身前，双手接球放在脖颈处，顺势将两只手臂弯成环状置于头顶，身体快速旋转，篮球在臂弯与头顶形成的空隙处飞旋，利落地背后收球然后将球传出。这是北京市大黄庄小学的同学在进行花式篮球训练时的场景……

与花式篮球的邂逅

指尖转球、胯下传球、胸前切球……孩子们变幻多端的招式让人应接不暇，篮球撞击地板的声音混合着孩子们的喊叫声让冬日里的校园一片生机勃勃。

大黄庄小学共有学生400余名，其中超过86%的学生来自市外务工家庭。学校共有两支花式篮球队，每支队伍在30人左右。“人生如球技，关键在勤奋”，这句话在校园里最为醒目的标语也是孩子们刻苦训练的真实写照。通常一周孩子们会进行四次训练，周一、周三、周五在校园进行练习，周六在和平西桥租用的室内场地训练，除了雨、雪、雾霾等特殊天气，一年四季皆是如此。

说起这所农民工子弟学校与花式篮球的初识还要说起六年前。那时，初来大黄庄小学任职的李红艳校长还在为寻找特色办学项目十分发愁。

“学校面积比较小，没有操场只有一个院子，孩子们的生活条件不太好，许多孩子都营养不良。”一方面，学校场地有限，资金有限，无法给学生提供更优质的教学环境；另一方面，学生家庭条件有限，沉重的生活负担让家长无暇顾及学生的特长培养。

至今李校长还记得那位家长的话。“李校长，您甭对孩子要求太多了，我能从山里出来卖茶叶，在这能有个小店铺，我就特别知足。”也正是这句话，让她担心起这群孩子们来，她怕家长会把这种情绪传递给孩子，瓦解孩子奋斗的热情。一次机缘巧合，李校长遇到了花式篮球教练韩炜，而韩教练恰好愿意在一所有农民工子弟学校的进行花式篮球教学的尝试，于是大黄庄小学的孩子们开始了与花式篮球的邂逅。

邂逅之初，李校长便把“人生如球技，关键在于勤奋”醒目地贴在学校的墙壁上，希望学生通过自己的奋斗实现留在北京的愿望。事实上，很多孩子已经因为花式篮球技能以“特长生”的身份进入了心仪的初中学习，

离自己留在北京的梦想更近了一步。

“零费用”的运动

与很多学校担心体育活动影响文化课成绩不同，大黄庄小学的老师们更看重体育锻炼带给孩子成长的长远价值。

花式篮球又称街头篮球，起源于美国纽约市哈林区的洛克公园，颇具视觉冲击力的运球、传球、扣篮动作与动感的街头嘻哈音乐相融合，使得花式篮球成为极具观赏性和表演性的篮球运动。不过对于大黄庄小学的孩子来说，花式篮球最重要的还是“零费用”。篮球由学校免费提供，教学由韩教练免费指导，孩子们很快就喜欢上了这项“省钱”的运动。

今年已经70岁的张老师是一名返聘教师，她特别鼓励学生参加花式篮球运动，甚至把加入花式篮球队当做一种奖励，鼓励学生积极报名。“我年轻的时候特别爱好体育，深知体育运动对青少年成长的重要性。花式篮球对提高孩子注意力的集中程度有很大帮助。”张老师告诉笔者，学生开始花式篮球训练后，不仅课堂的纪律性有所提高，而且学习的状态也更加积极了。

“以前我放学之后就经常去网吧，或者在外面疯跑，现在有了花式篮球，我觉得我的身边好像多了一个小伙伴。”花式篮球训练让今年四年级的梁俊豪在玩耍中找到了乐趣，也让他改掉了自己身上的“坏毛病”。过去梁俊豪非常调皮，上课注意力很难集中，通过花式篮球的训练，他不仅学习成绩有了进步，而且当上了班里的班长。

笔者了解到，花式篮球将运动、表演、音乐融为一体，训练方式能够有效激发青少年的表演欲望，提升他们的音乐感觉，对青少年整体气质的改变有很大帮助。在训练过程中，他们的运动天分能够得到较好发挥，身体素质也会得到相应改善。在最近一次的北京市朝阳区小学生体质健康测试中，大黄庄小学排名全区第一。

教练的“新梦想”

“我希望有一个能避风雨的篮球馆，让这帮有梦想、喜欢篮球的孩子改变自己的人生。我通过篮球也可以让他们获得真正的快乐，我的梦想很简单。”这是韩炜教练在浙江卫视中国梦想秀的舞台上对自己梦想的描述，现在他在为孩子们建造篮球馆的梦想已经初步实现。在大黄庄小学的校园里，一座新的篮球馆主体建筑已经完成，预计明年5月底可交付使用。

今年34岁的韩炜是地道的北京爷们儿，言语中带着豪爽、洒脱与幽默。他从1994年开始接触花式篮球，2000年之后，随着花式篮球在中国的普及，他将中国武术的动作融入花式篮球，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花式篮球表演风格。“能把自己的兴趣当做事业，我觉得很幸运。”韩炜十分喜欢小孩，于是选择了少儿花式篮球作为自己的教学项目。

“其实他们和城市孩子没有差别，无非就是城市孩子多知道一些电影电视，农村孩子认识的是山羊绵羊。”在韩教练眼中，这些农民工子女十分可爱，与城市孩子相比，他们的身上少了几分浮躁多了几分自卑。“有一次，我晚上带他们去王府井，孩子们指着街上的灯说，老师你看，这儿的灯真亮。”韩教练的语气有些激动，“当时我都快哭了，觉得以后一定要多带孩子们出来见世面，多让他们和名人接触。”

从2011年第一次登上CBA全明星赛的舞台开始，大黄庄小学的孩子们用花式篮球搭建起了一条连通世界的道路。他们不仅去过上海、青岛、大连等城市参加演出活动，还到过美国与当地的小朋友交流球技。几年来，他们在大大小小的场合作过数十次的花式篮球表演，参与人数达400多人次，还与马布里、易建联、莫慧兰等体坛明星进行过亲密接触。教室墙上的照片记录下孩子们的成功时刻，也记录下他们成长蜕变的人生轨迹。“明显能够感觉到孩子们更自信了，在镜头前的表现更加自然。”韩教练说，这次他们去上海参加活动，孩子们已经能够独立办理入住和登机手续了，面对一些场合也不发憷。

看到学生们成长进步，韩教练又有了自己的新梦想。“我想把新的体育馆做成一种文化，让更多农民工子女享受花式篮球的快乐。”受户籍制度、升学政策、父母工作变动等因素的影响，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学生成活流动性较大。虽然多数学生最终都会离开北京，但是韩教练希望花式篮球的精神能够伴随他们一生的成长，与花式篮球有关的时光能够成为北京留在孩子们心中的一份美好回忆……



学生在学校的空地上练习转球。温雅迪 摄

燕郊炒饭哥的城市梦

——从打工者到小老板的华丽转变

本报实习生 吴功娟

15个小时、100多斤土豆、十几个菜品、500多份盒饭，是齐海每天必须完成的工作量。每个月700块钱工资，10平方米的出租房，吃卖剩下的饭菜，是齐海初到燕郊的食宿。

“给别人干活不管你干多好，你干多少活别人都不满意，而且每次饭和菜没有打对数都会责怪我。给别人打工这碗饭不好吃……”经过几番商量，齐海决定辞职。

当初离开家时的志存高远，与现实中的迷茫、卑微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没有手艺、没有学历、没有人脉，如何在这个城市继续生存下去是当时最大的难题。但给别人卖盒饭的工作，不仅挣得少，经常受气还没有前途，与其如此忍气吞声，还不如孤注一掷”。回到家说服父母后，齐海带着家里仅剩的两万多块钱再次来到了燕郊。

“盒饭每次都要弄十几个菜，每个菜还不能量重。”齐海的工作除了择菜、洗菜、刷洗餐具，还要打饭。齐海刚到燕郊打工的时候恰逢冬天，为节省成本，洗菜、刷洗基本上用的都是凉水。每天6点上班一直干到晚上9点，

三轮车，齐海开始了他的创业。

“刚开始创业很困难，要面对很多精神上还有工作竞争上的压力。我那个时候刚18岁，没有学过就过来干，肯定竞争不过别人，心理压力更大，谁没有虚荣心啊，摆地摊是个很不体面的工作，在别人眼里也是个很没有前途的工作，但是不用受老板的气，赚的也比打工的时候多，在当时已经很满足了”。卖炒饭与其他不同，现炒现卖不仅美味也能按照顾客的口味对作料酌量添减，渐渐地顾客也多了起来。但这样也使得齐海的工作量更加繁重，为使炒饭更加入味，齐海每份炒饭都会颠勺30次左右，每天至少要炒200份左右，一天就得颠勺6000多次。当时的齐海体重只有61公斤，据他回忆说，“刚开始，手臂不是一般的疼，晚上睡觉都能疼醒了。当时疼得我也想不干了，可是想就这样不干了只会让别人看不起，慢慢地也就坚持下来了”。当初的无奈和辛酸似乎也给齐海现在的生活烙上了沉重的烙印，最初瘦削的臂膀也炼成了结实的肌肉。

齐海告诉笔者，当初来的时候就是想赚钱把老家的房子给翻盖了，觉得在这里扎根就是种奢望，六年时间，不料梦想也逐渐地被改变了。

“2010年的时候在老家买了个门脸房，2012年的时候在燕郊买了楼房，今年上半年把车也买了……说心里话我们都没想到有今天。”齐海的笑容里洋溢着满满的自豪感。

1989年出生的齐海比同龄人多了几分笃定，也多了几分淡然。当笔者问及关于以后有何规划时，齐海告诉笔者，卖炒饭这份职业是“拿着烫手放下舍不得”，每天早上9点出摊，晚上11点收摊，出摊前还有准备工作，晚上回来还要收拾东西，一天工作基本上都在15小时以上，所以到目前也一直单身。每次坚持不下去的时候，他都会告诉自己现在多吃点苦，以后就会更幸福一点。

“现在没有选择离开就是想再干两年给我哥买房，给父母他们减轻负担。”齐海说，“只要务实肯干，自己努力就能得到想要的一切。”



认定，是指低于法定或集体合同规定的工作时间的就业形式。据我国劳动法律规定，标准的工作时间为8小时。非全日制用工依据现行法律规定，其每天工作时间一般在3小时。因此对于想从事第二职业的劳动者，完全可以在不影响正常休息的情况下，在下班后的几个小时内为另外一家单位干点小活，并与其签订劳务合同或者是非全日制劳动合同，这样既能增多自己的收入，也不会违反法律的规定。

注意合同的内容。有的用人单位为了维护企业的利益在同劳动者签订合同时就明确规定，禁止劳动者与其他公司建立双重劳动关系。如果劳动者违反这种约定，用人单位则可以据此解除劳动合同，造成损失的，还有权要求劳动者进行赔偿。因此，劳动者在已与一家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情形下，再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也应慎重，既要避免违反已签劳动合同的约定也要考虑到后者对前者是否造成不良影响。

赵剑影 整理

老板不让我兼职怎么办？

职是在工作时间之外为他人打工。根据《劳动法》的规定，劳动者每天工作不超过八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十小时。该工作制度为法定标准工作时间。按规定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制度和不定时工作制度的，也以法定标准工作时间为基准计算。因此在法定标准工作时间之外的时间应当由劳动者个人支配和使用，从所有者的角度出发，工作业余时间归劳动者所有，任何单位、组织对此都无权予以支配和限制。

在《劳动合同法》颁布之前，我国有关劳动方面的法律、法规虽然没有对“兼职”做禁止性的规定，但用人单位普遍反对劳动者在外兼职。虽然现在法律不禁止兼职。但从事兼职工作，在时间上、精力上极有可能会影响到

的一种有效方式。像刘某某这样，该怎么处理才能保护自己的权益呢？

端正自己的行为。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签订的劳动合同是对双方权利义务的一个约定。劳动合同在劳动者对用人单位应尽的义务方面已经做了比较翔实的约定，这其中也包括了劳动者劳动时间的约定。只要劳动者对自己的工作已经尽职尽责，那么老板也没有小辫子可抓。同时下班后的时间属于劳动者个人自由支配，劳动者行为只要没有对本职工作和用人单位造成损害，用人单位是无权干涉的。但那些与单位存在保密协议的劳动者对于选择自己的第二职业需要慎重。

改变兼职的形式。非全日制用工是一种灵活的就业形式。按照国际劳动组织对它的

社区工会成农民工的“主心骨”

本报讯（通讯员周士龙 刘兴攀 记者张翀）伸出援手维权，助你就业创业、解您后顾之忧……在湖北省保康县歇马街社区，无论是农民工还是群众，无不让他们感受到社区工会的亲切可靠。

歇马街社区位于鄂西北的秦巴山区保康县，“八山一水一分田”是这里地理环境的写照，近年来，随着打工经济的异军突起，很多社区居民转身成了农民工。目前，社区农民工总数已达2400多人，占社区居民的一半。

面对社区庞大的农民工队伍，谁来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歇马街社区工会找到了适合本地实际的工作定位，形成了以“异地维权服务、创业就业服务、留守、安家、服务”为内容的农民工“三项服务”机制，先后参与农民工维权20多起，促进500多名农民工创业就业。

“你们帮我把事情解决了，如今我盖了新房，接你们去我家喝喜酒……”几年前，居民肖文平在阿尔及利亚打工，下班途中被过路车辆撞成股骨粉碎性骨折。经当地治疗一直不见好转，一心只为疗伤的肖文平提出回家治疗，家住国内的“工头”也承诺：只要肖文平回国，责任一概由他本人承担。然而，回国后的肖文平不仅没有得到“工头”落下的承诺，而且花光了自己的全部积蓄也未治愈骨伤，几乎绝望的他请歇马街社区工会帮他讨个说法。

社区工会几经奔波，一路搀扶着肖文平，找到以某建筑工程公司的项目经理为身份的包工头，经多次协商谈判，最终为肖文平讨回了60万元的赔偿。肖文平的骨折得到了进一步救治，还盖起了新房。他逢人就说：“国外出事，国内化险，要不是社区工会帮忙，后半生还不知道怎么过啊。”

远赴他乡为农民工讨公道，在歇马街社区工会已经不足为奇，正是歇马街社区工会不畏艰辛的维权路。

在歇马街社区工会主席吴文华的办公室，我们看到那本厚厚的农民工流动登记簿，上面记载着农民工务工地点、联系电话等详细内容。在社区工会服务中心，还见到农民工“维权流程图”、“维权服务卡”等。社区网格员兼任工会小组长和维权联络员“一岗双责”制……为农民工撑起了一片蓝天。

